托克维尔在1856年写作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仍被大众所注意，除了作者本人对历史现象背后的脉络深刻的洞察之外，书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的反直觉、箴言式的论断也是极重要的原因，在今天无疑仍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冲击，试看下面的这些例子：

“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

“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

“但是，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改革（笔者注：路易十六的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

作者在本书中并未直接分析大革命本身，而是探究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大革命对旧制度的继承。后者所阐述的道理，即革命后的社会不是与革命前截然相异的，许多新的、在革命后的社会蓬勃发展的那些因素许多都已在革命前的“旧社会”中萌芽，这一观点已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并在不同的历史问题中得到验证，如中世纪之于近代。此例证了作者的深刻观察。

而关于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已在上面的所引用的部分原文中有所体现。初读之下，托克维尔的观点似乎与直觉不符，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确实如此，而且也如作者所言，历史在不停重复。仅俄罗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就可两次对这一结论做出佐证，斯托雷平的改革反而在国内促进了二月革命，间接导致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埋葬了煊赫一时的红色帝国。但要注意的是，作者未清楚说明，这不能得出不应改革或改革错误的谬论，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改革得太晚了，这才导致改革不但未能挽救政权，反倒促使了现有秩序得迅速崩溃。王岐山据说也十分重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鼓励高级干部也去读，但如果他只是看到了问题的第一层，那不过是甚大的误解，只会使之后的所谓“清算”更为惨烈。

关于革命笔者还想讨论的，是关于作者评价到的，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这要与之前说的，改革得过于迟缓与不得当相联系。可以说，大革命得这种快速性既是其功绩又是诸多病症的原因，猛烈无比的革命狂潮，不仅将许多旧的、不合时宜的桎梏一并扫除，也在展开的过程中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对于新的稳定秩序的建立弊大于利，这也是巍峨和大革命后的法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政治上动荡不断。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激烈的革命终归不如稳健扎实的改革。但改革毕竟是有历史时机的限制和人物能力的要求的，可遇而不可求，失之则难复。

最后是一点余论，“巴黎就是法国本身”，这既是因为法国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制，同样是由于法国的面积本就不能与美国或中国相比较，举国之力只足够支撑起一座超级都市。